

发展文库

马洪 主编

韩国的 经济发展

[韩] 赵淳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E V E L O P M E N T

D E V E L O P M E N T

发展文库

马洪 主编

韩国的经济发展

[韩] 赵 淳 著

李桐连 兰炜班 译
赵声华 崔 昕

中 国 发 展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国的经济发展/(韩国)赵淳著;李桐连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8

(发展文库/马洪主编)

ISBN 7-80087-265-3

I. 韩…

II. ①赵…②李…

III. 经济发展-研究-韩国

IV. F13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7271 号

图字:01-97-0636 号

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赵登禹路金果胡同 8 号)

邮政编码:100035 电话:66180781

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1/32 787×1092mm 印张:8.375

字数:168 千字 印数:1—8000 册

定价:14.80 元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差错,可向发行部调换

《发展文库》编委会

主 编：马 洪

副主编：朱 兵

执行编委：蔡建国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宁宁	马 洪	马建堂	王西玉	王金友
王家福	王慧炯	方 文	邓寿鹏	史桂开
宁运久	吕 薇	乔仁毅	朱 兵	朱培培
任兴洲	米建国	孙广信	孙孝明	李一奎
李永芬	李克穆	李京文	李泊溪	李桐连
李善同	李隆铭	吴凯泰	吴敬琏	何静芝
张小济	张云凤	张云方	张连顺	张卓元
张果喜	张济时	张景荣	陈 仁	陈吉元
陈森辉	陈锡文	武 超	林毅夫	岳颂东
周叔莲	周国印	郑广银	郑永刚	宗庆后
赵维绶	赵新先	徐文荣	郭伟帆	郭励弘
高冠江	章含之	程秀生	蒋梦兰	鲁志强
鲁灿松	谢伏瞻	楼忠福	楼金炎	路凤鸣
蔡建国				

前 言

鉴于韩国已迅速成为世界上经济领先发展的国家之一，本所开展了一系列有关韩国的研究项目。1993年初，我们出版了由韩国前财务部长司空壹撰写的《世界经济中的韩国》；1990年出版了由贝拉·巴拉萨和约翰·威廉森合著的并已经修订的著作《通向成功的调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国际收支政策》，该书有大量有关韩国的内容；1989年出版了由托马斯·奥·贝阿德和杨秀吉编辑的论文集，题为《美韩经济关系：冲突和合作》。马克斯·诺兰德在1990年就已分析并指出，韩国是太平洋盆地发展中国家之一。由朴英哲和俞正镐合著并由杰弗里·杰·肖特于1989年编辑的《自由贸易区和美国的贸易政策》一书指出了建立美韩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1994年2月，本所举办了韩美21世纪委员会成立后的首次会议，旨在加强韩美两国间的经济关系。

本书对韩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及其未来前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作者赵淳博士曾任韩国副总理、韩国银行行长。赵博士以前曾是汉城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1987年作为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第三世界访问学者”之一在本所从事研究。他在

分析工作中独特地将学术思想和实际经验结合在一起。我们觉得他的分析对于人们更好地了解“韩国的经济奇迹”以及这一奇迹的发展趋势将大有裨益。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是一家研究国际经济政策的非营利性私立机构，其宗旨是研究国际经济领域的重要问题并提出和交流解决这些问题的实际方法。本所无任何党派背景。

本所主要由慈善机构资助，其中主要的社会事业性资助来自美国的杰曼·马歇尔基金会。在该基金会的慷慨资助下，本所于1981年创立。此外，福特基金会、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威廉·M·凯克基金会、C·V·斯塔尔基金会以及美日基金会也均为本所提供了资助。另有一些基金会和私人公司也为本所提供了支持。在最近一个财政年度我所的资金中约有16%是国外捐助的，其中包括日本提供的7%。

董事会对本所承担全部责任，并原则性地指导并审批本所的研究计划，其中包括对一些国际上制定中期经济政策（一般为1~3年）的人士来说可能会成为重要内容的课题加以认证。鉴于此，这些课题需由本所提出。所长与全所工作人员及所外顾问委员会协力工作，主要负责特别项目的开发并对出版个人研究成果拥有最终决策权。

本所希望其研究和有关活动能为在全世界开展国际经济政策研究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希望本所出版物的读者能就如何可以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上述目标为本所提供良策。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弗雷德·伯格斯坦

1994年2月

中文版前言

我于1994年通过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以下简称IIE)出版了一本以韩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应旨在改善各种经济制度中被扭曲的部分、使经济更加切实发展为主要内容的英文书籍。该书已由我的学生们翻译成韩文出版,如今又在对本人奠定学术基础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中国翻译成中文出版,我对此感到无比高兴。事实上,此书的英文版问世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且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1987年秋,我有机会被美国华盛顿的IIE聘请作为首批外国客座研究员在该所工作了一年。为表达对IIE弗雷德·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所长的谢意,我决定写一本有关韩国经济政策的书赠送给他。

在华盛顿,不但有关韩国经济的资料很少,而且也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完成本书的确有很多困难。幸好还是完成了草稿,打算修改补充几点之后,再交给研究所。后来我于1988年春回到了韩国,因出任政府职务而耽误了写作。在我辞去副总理职务就任韩国银行行长后,在银行调查部朴哲副部长和李相宪调查役的帮助下,终于完成了书稿并在IIE出版。

我要感谢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特别要感谢弗雷德·伯格斯坦所长和所里的同事们对我的帮助和表现出的耐心。我还要感谢在华盛顿期间给我慷慨帮助的霍华德大学的郭承荣教授、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朴钟安博士和世界银行的赵润济博士。韩国开发研究院的李启植博士在经济企划院中是我的助手，尽力鼓励我完成本书。韩国银行调查部的经济学家阅读过我的书稿，并提供了有关的数字和表格。我要特别感谢朴哲先生和李相宪先生，他们向我提供了有价值的最新资料。我衷心感谢瓦莱利亚·诺维尔女士出色地编辑了我的全部书稿，我还要感谢我的干练的秘书金志禧小姐对我的耐心协助。当然，本书的不足之处完全由我个人承担。

作者序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于1987年为我提供了一笔访问学者基金，使我能有机会在华盛顿逗留一年。一年的研究所工作使我受益匪浅，每周的研讨会令人得到启发和教益。该所当时乃至现在一直在从事包括韩国问题在内的带有争议的政策性研究。

研究所的气氛激励着我写一本篇幅不大的有关韩国的书。我认为，我对韩国经济的分析或许可作为有关介绍韩国经济材料的有益补充。我力图在到韩国政府任职前完成本书的手稿，而我在政府任职期间又恰好是韩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民主运动以及伴随而来的劳资纠纷和通货膨胀。我离开政府后被任命为韩国银行行长。

我离开公职后便决定完成本书。在韩国和世界各地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虽然无法将所有这些事情纳入本书，但我采用了最新的数据，并对最近发生的事情续写了章节。

正如同大多数东亚国家的经济一样，韩国的经济也处于转折期。韩国政府对所要采取的政策态度坚定。我希望本书所表述的观点能成为有用的参考。

去年夏季正在进行韩文翻译的时候,我的一个参加过草稿修改工作的学生,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的郑永禄君提出出版中文版的建议。据郑君说,他在韩国驻华大使馆工作时,很多中国朋友对韩国经济的发展经验极为关注,并请求提供有关资料,但因无中文版资料而未能满足要求,对此他们深感遗憾。为此,他请我允许出版中文版。我欣然答应了他。

此书的基本观点之一是,要使经济和社会更加稳步地发展,最重要的是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广义的制度(Institution)。中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尝试。我认为经济体制的改革在中国也必然是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制度是人类制定的,但是一旦形成,人类就要受它支配。人类制定的制度里既有推动经济优化发展的因素,也有起反作用的因素。我们至今所制定的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里,也有许多向不利方面诱导经济活动的因素。改变这种弊端,正是制定经济政策的核心所在。如能通过此书将这一点传达给中国读者,出版此书的目的也算达到了。特别是韩国经济政策的成功和失败经验,将会或多或少地帮助中国减少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失误。

此书能够由中国政府的最高智囊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翻译,对我来说是非常高兴而且荣幸的事情。在此,谨向参加翻译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合作部李桐连部长、兰炜班处长、赵声华副处长、崔昕副处长,还有郑永禄君,表示深深的谢意。

赵 淳

1996年12月7日

1 章

引言

1.1 研究目标

韩国近 40 年来的经济发展几乎受到普遍的赞誉。除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外，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能与其蓬勃的增长相比。对那些熟悉韩国当时社会经济形势的人而言，韩国工业化的速度简直是一个奇迹。韩国于 1945 年从日本统治下得到解放，当时韩国位于世界上最穷国之列，然而过了 40 年，韩国已成为一个工业国。

韩国解放后，随之而来的政治混乱和经济崩溃令人畏惧。幸存下来的经济在 1950~1953 年那场灾难性战争中遭到破坏。直到 50 年代末，韩国也只能是勉强维持生存。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像像韩国这样一个国家能在国际经济界作为一个工业化国家得到承认。在发展中国家，韩国是屈指可数的获得经济成功的国家之一。仅此而言，对于那些研究经济的人来

说，韩国的经济发展就是十分了不起的。

有关韩国经济的著述很多，其成功的历史也由人一再转述。然而，作者认为仍有必要写这本书，因为韩国成功的真谛并未被韩国人乃至其他国家所充分了解。此外，韩国国内及国际上近年来的一些变化也迫使韩国进行有深远意义的调整。因此，就需要对韩国经济发展提出新的观点。韩国正要迈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些在过去指导韩国发展的理论已日趋过时。

本书的研究目的就是根据近年来韩国国内外的一些变化，提出韩国经济发展的新观点。作者将评价近 30 年来韩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并分析在今后几十年中韩国将面临的障碍和前景。作者会提出克服障碍的指导性策略以及如何利用机遇。通过回顾政界、企业界和产业界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作者希望能突出描述韩国发展的独特模式并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解释韩国成功的原因以及这一成功所可能带来的影响。

韩国的经验之所以值得仔细研究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韩国所遵循的发展道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的发展道路十分类似，因此，通过仔细的研究，可以帮助经济学家对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制定出一套有关的并带有普遍性的方法。第二，对研究经济发展的人员而言，韩国能否最终发展成为一个经济上的发达国家仍然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在 19 世纪，日本是惟一个实现现代化的非欧洲国家，日本的经验一直引起社会学家的兴趣。在战后时期，韩国和其他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经历了相似的改革。韩国可以在多长时间内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将是社会学者十分感兴趣的问题。在世界经济史中，韩国未来改革的传奇意义将不亚于日本。

1.2 对过去经济增长的看法

1.2.1 密集增长

如 2 章所述,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在 1961 年以前增长十分迟缓,但自 1962 年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开始执行以后,便加快了增长速度。除台湾等地区外^[1],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达到了这样高的增长速度。

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增长率超过了发达国家在发展同期的增长率。从 1886 年至 1913 年,美国取得了在先进国家中 4.3% 的最高年均增长率。日本在 1913 年至 1938 年战争期间增长率达到 4.5%^[2]。从 1868 年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虽然创造了持续快速增长的记录,但却不能和 60 年代到 70 年代的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济增长相比。只有在战后时期,日本取得的相应增长率才能与韩国和台湾地区相比。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日本的年均增长率约为 10%,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水平。

近 30 年来,韩国和台湾地区从传统的农业型经济过渡到工业型经济。韩国和台湾地区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可以和发达国家在 100 多年中的成就相比,也就是说韩国和台湾地区将需要 1 个世纪才能取得的发展成就缩短为 30 年。

同样,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 17%。在战后时期,日本成功地从一个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转变成为一个发达国家。日本也将通常为漫长和缓慢的经济成熟期浓缩为几十年(本章还要解释日本的增长过程在某些方面的确与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典型的、简单的密集增长

过程不同)。

这里出现了几个有趣的现象。第一，取得密集增长的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有着相似的自然条件。第二，它们均在战后大约同一时期取得了高速的发展。上述两个事实说明，它们的相似经历不是一种偶然的事情，一定有某些共同的因素促成了它们的高速发展。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它们在资源条件方面的相似。韩国的煤、铁、钨、石灰石和高岭土等资源十分有限，而其他资源也很少或没有，即使是发展农业的资源也不充裕。可耕地只占全部土地的 20%，气候、土壤、降雨量和温度都对发展农业生产不利。台湾地区和日本的自然资源也不比韩国强多少。由于贫瘠的自然资源，台湾地区、日本和韩国需要进口发展工业的大部分原材料。即使台湾地区、日本和韩国单位土地的农业生产率在世界上位于前列，它们仍要进口相当数量的农产品。

与贫瘠的自然资源相比，韩国有较好的人力资源。1992 年，韩国人口为 4370 万，比 50 年代初增加了两倍。韩国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每平方公里 440 人。除城市化国家之外，孟加拉国人口密度最大（每平方公里 499 人），韩国仅次于台湾地区（每平方公里 533 人），列第三位。^[3]

由于人口众多而又国土狭小，韩国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到处是剩余劳动力。只够维持生存的工资率主要取决于农业因素。事实上，在韩国发展经济的初期，农村到处是隐形失业，而城市则可见公开失业。开发城乡的可能性主要在于制造业有效利用这些剩余劳动力。确切地说，不是所有有剩余劳动

力的国家都能有效地发展制造业，这些劳动力需要具备现代工业活动所需要的条件，如最低标准的文化、纪律性和“超过别人”的想法，此外，还需要有活跃的企业家能力、行政管理技能和政府的效率。

在这方面，韩国人民具备制造业所需要的条件。多年来在稀少的土地上去维持生计培养了强烈的生存意识，如坚韧不拔和务实精神。潜在的劳动力大部分具有文化并愿在低工资条件下长时间工作。许多具有“敢做”精神的企业家脱颖而出，他们得益于政府鼓励用有利的银行贷款和外汇分配去投资的政策。

许多经济学家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韩国成功的原因在于采纳了出口引导型增长战略。但这种观点引出了两个问题：为什么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采取同样的出口引导型战略？为什么有些采用了出口引导型战略的国家没有取得像韩国那样的成功？举例说，与拉丁美洲国家相比，韩国之所以能更容易和有效地采用这一战略有两个原因：第一，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韩国在发展阶段的相对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第二，出口引导型战略使得韩国能利用其相对优势。这一战略还使韩国可以充分利用剩余要素（即劳动力），并解除由于缺少其他要素（即自然资源）而造成的羁绊。因此可以看出，韩国的出口引导型战略在整个 60 年代都是引导韩国人民去除传统束缚所做的一种政策选择^[4]。这一战略在 60 年代得到有利的国际环境的保障而得以执行。

1.2.2 促成密集增长的因素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战后东亚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更能发展制造业。人们记得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曾证明，一

个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速度往往要比发达国家快，主要原因是它可以利用更发达国家的技术革新成果。如果用本书的表述来换句话说，就是落后国家可以通过发展和技术革新来“浓缩”工业化进程^[5]。韩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似乎证明了格申克龙的理论，虽然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还有其他一些有利于发展的因素。

首先，与 19 世纪开始发展的国家相比，今天无论是技术还是资本都更容易引进。以现在的发达国家而言，它们的技术和资本以前大多是来自本国。资本要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去积累，而技术则要通过艰苦的学习过程来不断提高。然而现在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在发展的初级阶段省去这一过程。它们可以引进技术和资本，因而可以消除出口引导型增长的障碍。

第二，对今天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小型国内市场不再如以前那样会束缚发展。根据传统的贸易理论，一个出口国家在开发海外市场之前通常要满足国内市场，以收集用户的喜好并使消费者喜欢其产品。随着收入的增加，与外界隔离的国内市场也会扩大，这当然是一个很慢的过程。50 年代流行的经济发展的“大推动”模式旨在通过投资的“大推动”来打破这一特殊的瓶颈。

但在战后年代，发达国家几乎没有限制的市场给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敞开了大门，就如同那些国家掌握了这些市场的信息一样。此外，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通常符合标准，发达国家对产品的要求事实上得到了保障。所以，在发展的初始阶段，现在的发展中国家在向海外市场出口产品之前，不再需要发展国内市场，它们甚至可以在国内消费者青睐其产

品之前就将产品出口到国外。

对当今资源缺乏国家而言，在战后技术发展模式方面还有第三点有利因素。资源节约型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制成后产品的资源含量不断大幅度降低，资源贫瘠的国家对此大为宽慰。近年来，资源节约型技术取得了各种各样的进步，正如同能源技术所展示的那样。因此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相比，资源已成为次要的束缚。对劳动力剩余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报酬递减率正成为次要的痛苦。

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今天的世界已不像 100 年前那样被帝国主义所主宰。根据传统的概念，只有最发达和最强大的贸易国才能从自由贸易中获利。19 世纪就是如此，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强迫欠发达国家开放口岸。在这一时期，发达国家的商船往往装备有枪炮。而今天，欠发达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战中处于优势地位。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一书中指出，富国和穷国之间的贸易将使双方受益，但后者比前者相对收益要多，前提是前者不使用武力。斯密的预言今天已部分得到证实。

至此，我们已讨论了过去 30 年来对韩国和台湾地区以及 1955 至 1973 年对日本“密集型”增长有利的因素，这个因素对三者而言多少是共同的。然而，有趣和重要的是，韩国、台湾地区和日本在发展战略和经济管理方式的推进上存在着诸多的不同之处。这些不同点可能会说明三者在经济运作和社会环境方面为何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偏差。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搞清三者的共同因素和不同的发展模式。

1.2.3 政府的作用

总的来说，与台湾地区和日本相比，韩国政府在发展经